



实用主义的误读

杜威哲学对中国现代哲学的影响

顾红亮 * 著

实用主义的误读

——杜威哲学对中国现代哲学的影响

顾红亮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桂林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实用主义的误读：杜威哲学对中国现代哲学的影响 /
顾红亮 著.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 10

(智慧的探索丛书)

ISBN 978 - 7 - 5495 - 6901 - 4

I. ①实… II. ①顾… III. ①实用主义-影响-现代
哲学-研究-中国 IV. ①B2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144958 号

出 品 人：刘广汉

责任编辑：肖 莉

特约编辑：李春勇

装帧设计：徐 妙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中华路 22 号 邮政编码：541001)
(网址：http://www. bbtpress. com)

出版人：何林夏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销售热线：021 - 31260822 - 882/883

山东鸿君杰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印刷

(山东省淄博市桓台县寿济路 13188 号 邮政编码：256401)

开本：690mm × 960mm 1/16

印张：23. 25 字数：345 千字

2015 年 10 月第 1 版 2015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68.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单位联系调换。

“智慧的探索丛书”编委会

(以汉语拼音为序)

陈卫平 冯 棉 高瑞泉 刘广汉
童世骏 杨国荣 郁振华



作者简介

顾红亮,1971年生,浙江萧山人。哲学博士。现为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哲学史、中西哲学比较研究。曾在 Bar-Ilan University (2003—2004)、University of Illinois (2007—2008)、Harvard University (2010—2011)作学术研究。主要著作有《实用主义的误读》、《现代中国平民化人格话语》、《儒家生活世界》。

总 序

杨国荣

作为把握世界的观念形态,哲学的内在规定体现于智慧的追问或智慧之思。这不仅仅在于“哲学”(philosophy)在词源上与智慧相涉,而且在更实质的意义上缘于以下事实:正是通过智慧的追问或智慧之思,哲学与其他把握世界的形式区分开来。这一意义上的智慧——作为哲学实质内涵的智慧,首先相对于知识而言。如所周知,知识的特点主要是以分门别类的方式把握世界,其典型的形态即是科学。科学属分科之学,中文以“科学”(分科之学)作为“science”的译名,无疑也体现了科学(science)的特征。知识之“分科”,意味着以分门别类的方式把握世界:如果具体地考察科学的不同分支,就可以注意到,其共同的特点在于以不同的角度或特定的视域去考察世界的某一方面或领域。自然科学领域中的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地理学、地质学,等等,侧重于从特定的维度去理解、把握自然对象。社会科学领域中的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法学,等等,则主要把握社会领域中的相关事物。无论是自然科学,抑或社会科学,其研究领域和研究对象都界限分明。以上现象表明,在知识的层面,对世界的把握主要以区分、划界的方式展开。

然而,在知识从不同的角度对世界分而观之以前,世界首先以统一、整体的形态存在:具体、现实的世界本身是整体的、统一的存在。与这一基本的事实相联系,如欲真实地把握这一世界本身,便不能仅仅限于知识的形态、以彼此相分的方式去考察,而是同时需要跨越知识的界限,从整体、统一的层面加以理解。智慧不同于知识的基本之点,就在于以跨越界限的方式

去理解这一世界,其内在旨趣则在于走向具体、真实的存在。可以看到,这一意义上的“智慧”主要与分门别类的理解世界方式相对。

具体而言,智慧又展开为对世界的理解与对人自身的理解二重向度。关于世界的理解,可以从康德的思考中多少有所了解。康德在哲学上区分把握存在的不同形态,包括感性、知性、理性。他所说的理性有特定的含义,其研究的对象主要表现为理念。理念包括灵魂、世界、上帝,其中的“世界”,则被理解为现象的综合统一:在康德那里,现象的总体即构成了世界(world)。^①不难注意到,以“世界”为形式的理念,首先是在统一、整体的意义上使用的。对世界的这种理解,与感性和知性的层面对现象的把握不同,在这一意义上,康德所说的理性,与“智慧”这种理解世界的方式处于同一序列,可以将其视为形上智慧。确实,从哲学的层面上去理解世界,侧重于把握世界的整体、统一形态,后者同时又展开为一个过程,通常所谓统一性原理、发展原理,同时便具体表现为在智慧层面对世界的把握。

历史地看,尽管“哲学”以及与哲学实质内涵相关的“智慧”等概念在中国相对晚出,但这并不是说,在中国传统的思想中不存在以智慧的方式去把握世界的理论活动与理论形态。这里需要区分特定的概念与实质的思想,特定概念(如“哲学”以及与哲学实质内涵相关的“智慧”等)的晚出并不意味着实质层面的思想和观念也同时付诸阙如。

当然,智慧之思在中国哲学中有其独特的形式,后者具体表现为对“性与天道”的追问。中国古代没有运用“哲学”和“智慧”等概念,但却很早便展开了对“性与天道”的追问。从实质的层面看,“性与天道”的追问不同于器物或器技层面的探索,其特点在于以不囿于特定界域的方式把握世界。

“性与天道”的追问是就总体而言,分开来看,“天道”更多地与世界的普遍原理相联系,“性”在狭义上和人性相关,在广义上则关乎人的整个存在,“性与天道”,合起来便涉及宇宙人生的一般原理。这一意义上的“性与天道”,在实质层面上构成了智慧之思的对象。智慧之思所指向的是宇宙人生的一般原理,关于“性与天道”的追问,同样以宇宙人生的一般原理为其实质内容。

^① 参见 Kant, *Critique of Pure Reason*, Translated by N. K. Smith, Bedford/St. Martin's Boston, New York, 1965, p. 323。

从先秦开始,中国的哲学家已开始对“道”和“技”加以区分,庄子即提出了“技”进于“道”的思想,其中的“技”涉及经验性的知识,“道”则超越于以上层面。与“道”“技”之分相关的是“道”“器”之别,所谓“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便表明了这一点,其中的“器”主要指具体的器物,属经验的、知识领域的对象,“道”则跨越特定的经验之域,对道的追问相应地也不同于知识性、器物性的探求,作为指向形上之域的思与辨,它在实质上与智慧对世界的理解属同一序列。至中国古典哲学终结时期,哲学家进一步区分器物之学或专门之学与“性道之学”,在龚自珍那里便可看到这一点。器物之学或专门之学以分门别类的方式把握对象,“性道之学”则关注宇宙人生的普遍原理。在器物之学与性道之学的分别之后,是知识与智慧的分野。以上事实表明,中国哲学不仅实际地通过“性与天道”的追问展开智慧之思,而且对这种不同于知识或器物之知的把握世界方式,逐渐形成了理论层面的自觉意识。

可以看到,以有别于知识、技术、器物之学的方式把握世界,构成了智慧之思的实质内容。西方的 philosophy,中国的“性道之学”,在以上方面具有内在的相通性,其共同的特点在于超越分门别类的知识、技术或器物之学,以智慧的方式把握世界。

中国哲学步入近代以后,以“性与天道”为内容的智慧之思,在社会的变迁与思想的激荡中绵延相继,并逐渐形成了不同的哲学进路。这种趋向在中国当代哲学的发展中依然得到了延续,华东师范大学哲学学科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便从一个侧面体现了这一点。华东师范大学的哲学学科建立于20世纪50年代初,她的奠基者为冯契先生。冯契先生早年(20世纪30年代)在清华大学哲学系学习,师从金岳霖先生。20世纪30年代的清华大学哲学系以注重理论思考和逻辑分析见长,并由此在中国现代哲学独树一帜,金岳霖先生是这一哲学进路的重要代表。他的《逻辑》体现了当时中国哲学界对现代逻辑的把握,与之相联系的是其严密的逻辑分析方法;他的《论道》展示了对“性道之学”的现代思考,其中包含着对形上智慧的思与辨;他的《知识论》注重知识的分析性考察,但又不限于分析哲学的形式化进路,而是以认识论与本体论的融合为其特点。金岳霖先生在哲学领域的以上探索,可以视为以智慧为指向的“性道之学”在现代的展开,这种探索在冯契先生

那里获得了承继和进一步的发展。与金岳霖先生一样,冯契先生毕生从事的,是智慧之思。在半个多世纪的思想跋涉中,冯契先生既历经了西方的智慧之路,又沉潜于中国的智慧长河,而对人类认识史的这种楔入与反省,又伴随着马克思主义的洗礼及时代问题的关注。从早年的《智慧》到晚年的《智慧说三篇》,冯契先生以始于智慧又终于智慧的长期沉思,既上承了金岳霖先生所代表的近代清华哲学进路,又以新的形态延续了中国传统哲学的智慧历程。

自20世纪50年代初到华东师范大学任教之后,冯契先生在创建华东师范大学哲学学科的同时,也把清华的哲学风格带到了这所学校,而关注哲学史研究与哲学理论研究的交融,重视逻辑分析,致力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的互动,则逐渐构成为华东师范大学哲学学科的独特学术传统。半个多世纪以来,华东师范大学的哲学学科经历了从初建到发展的过程,其间薪火相传,学人代出,学术传统绵绵相续,为海内外学界所瞩目。以智慧为指向,华东师范大学的哲学学科同时具有开放性:在上承自身传统的同时,她也在学术研究方面鼓励富有个性的创造性探究,并为来自不同学术传统的学人提供充分的发展空间。这里体现的是哲学传统中的一本而分殊:“一本”,表现为追寻智慧过程中前后相承的内在学术脉络,“分殊”,则展示了多样化的学术个性。事实上,智慧之思本身总是同时展开为对智慧的个性化探索。

作为哲学丛书,“智慧的探索丛书”收入了华东师范大学哲学学科几代学人的哲学论著,其中既有学科创始人的奠基性文本,也有年轻后人的探索之作,它在显现华东师范大学哲学学科发展历程的同时,也展示了几代学人的智慧之思。在冯契先生100周年诞辰到来之际,这一丛书的出版,无疑有其独特的意义:它不仅仅表现为对华东师范大学哲学传统的回顾和总结,而且更预示着这一传统未来发展的走向。从更广的视域看,华东师范大学哲学学科的衍化,同时又以当代中国哲学的演变为背景,在此意义上,“智慧的探索丛书”也从一个方面折射了当代中国哲学的发展过程。

序 言

陈卫平

摆在读者面前的这部著作,是以胡适和陶行知为中心来考察杜威哲学对中国近现代哲学的影响,是顾红亮博士在其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我在写这篇序时突然想到:20年前我的硕士毕业论文和20年后我指导的第一篇博士论文有一个共同点,即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以胡适为主要研究对象的。由此生出两点感慨:一是对胡适的研究在不断深入,20年前胡适研究还是个有点风险的课题,20年后胡适研究则成了显学。二是20年时光弹指而过,当年冯契先生指导我写论文的情景还历历在目,如今却轮到我给学生辈的著作写序,可见又一代学术新人正在成长起来。

中国近现代哲学与传统哲学的一个显著不同点,是中西哲学的合流。以20世纪来说,中国哲学的两大主流即进化论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很显然是中西哲学合流的产物。然而,西方哲学到底对中国近现代哲学产生了哪些影响,为什么会产生这样或那样的影响,如何评价这些影响等等,都是需要很多人经过深入的研究才能回答的问题,顾红亮的著作试图从一个侧面即杜威实用主义对中国近现代哲学的影响来考察上述问题。哲学史的研究是史学研究和哲学研究的结合,一方面要广泛征集史料,并对其进行仔细的考辨;另一方面则要在综合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作出自己的理论概括和创新。应当说,顾红亮的著作在这两方面都是做得比较好的。在前一方面,他不仅收罗了杜威哲学在中国影响的方方面面的资料,而且对这些资料进行

了必要的梳理,在这部著作的正文和附录里是不难感受到的。在后一方面,他从实在论、知行论、方法论、群己论、民主论、教育论等六个方面比较全面地论述了杜威哲学对中国近现代哲学的多重影响,以及这些影响与时代、传统的关系,多有发前人未发之新论,尤其是后三章。同时,这部著作所运用的思潮研究和人物研究相结合、主要人物和次要人物相结合、中西比较和古今比较相结合的方法,也是恰当的。因为杜威实用主义曾是“五四”前后中国的一种哲学思潮,使其发生影响的最主要人物是胡适和陶行知;然而还有些相对次要的人物如张东荪、蒋梦麟、陈鹤琴等,也对杜威实用主义在中国的影响力起到这样或那样的作用;分析杜威实用主义在中国的影响,无疑要考察它与中国传统哲学的同异,考察它与中国近现代哲学对传统哲学所进行的变革的关系。

当然,作为学术研究的初步成果,该书不免还有某些不完善、不成熟的地方。这些不完善、不成熟的地方,相信作者在今后的学术研究中会作进一步的改进。

相对于整个西方思想对中国近现代的影响而言,杜威哲学对中国近现代哲学的影响,是一种个案的研究。由此我想引出一些关于西方思想对中国近现代影响的一般性看法。西方思想影响中国的过程或者说西方思想在中国产生影响力的过程,就其本质而言是中国化过程。所谓的中国化,可以从两个层面来分析:社会层面和文化层面。就社会层面而言,中国近现代是个社会大变动的时代,西方思想之所以能影响中国,是由于它们总是在某种程度、某个方面满足了中国近现代社会大变动的需求。“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需要的程度。”(马克思语)某一西方思想在中国影响力的大小即其中国化的深浅,取决于它满足中国近现代社会大变动的需求的广度和深度。就文化层面而言,西方思想的中国化是指它们在中国取得了新的理论形态,有着与其在西方不尽相同的面貌,如进化论在中国取得了世界观的新形态,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取得了毛泽东思想的新形态,杜威实用主义在中国主要是以科学方法论的新形态出现的,而柏格森、尼采等直觉主义、意志主义在中国主要是以非理性主义人生观的新形态出现的。当然,这两个层面是互相关联的:前者制约后者,后者反映前者。

就文化层面而言,在西方思想的中国化过程中,始终贯穿着如何对待传

统文化的问题。这里存在着三个内在联系的环节:变革、融合、制约。

与中国近现代社会的大变动相适应,被中国人所青睐的基本上是西方的近代思想。这些西方思想和中国传统文化存在着时代性差异:前者是在资本主义工业化过程中产生的,后者是在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封建社会里形成的。这就决定了西方近代思想中国化的过程,必然是对中国传统文化变革的过程。没有这样的变革,西方近代思想是无法在中国显示其影响的。这样的变革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西方近代思想是以文艺复兴为直接背景的。在中国步入近代以前的明清之际,已有着某些类似西方文艺复兴的思想胚芽。这就为中国人接受和理解西方近代思想提供了可能性。因而梁启超曾把在西方思想激荡下产生的中国近代思想称作明清之际思想的“复活”。提供了接受和理解西方近代思想的可能性,也就提供了用西方近代思想变革传统文化的可能性。因为只有接受和理解了西方近代思想,才谈得上它对传统文化的变革。

在西方近代思想中国化过程中对传统文化的变革,是为了使人们认同西方近代思想的观念。对任何外来新的思想观念的认同,实际上是将其或多或少地与传统文化相融合。否则,外来思想就会被看作是纯粹从外国输入和强加的,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是没有根基的,从而无法获得认同感。因此,西方近代思想中国化的另一个重要环节,就是自觉地融合传统文化。一般来说,两者的融合是以两者具有某种相通性为基础的。西方近代思想和中国传统文化尽管存在着时代性、民族性的差异,但由于两者所要回答的宇宙人生的根本性问题是共同的,因而在对共同问题的回答里总有某些相通之处。这就使得两者的融合是有可能的。西方近代思想中国化是在将这两者处于自在状态的相通之处予以自觉地融合的过程中实现的。

变革和融合这两个环节在西方近代思想中国化的过程中是内在地联系在一起:变革不仅仅是传统文化的否弃,同时也包含着对传统文化的提升;融合是在变革传统文化的过程中实现的,同时又使变革获得文化上的认同感和亲和力。然而,无论是变革或者融合,是以对西方近代思想理解(把握)为前提的。理解总是在主体的“前理解”即原有观念结构的作用下发生的,而传统文化的观念或意识在主体的原有观念结构中占有一定的位置。因此,传统文化作为主体的观念结构的组成部分也参与了对西方近代思想

的理解,也就不可避免地制约着对西方近代思想的理解,即传统观念或意识渗入到对西方近代思想的理解中去,使其打上传统观念或意识的印记。这种制约作用对主体而言,往往是无意识的,但却是不能忽视的。这是因为这种制约作用通过影响主体对西方近代思想的理解从而影响其对传统文化的变革和融合。所以,传统文化的制约成为西方近代思想中国化过程中,与变革、融合交织在一起的又一个环节。

以上只是十分粗略地谈了一些西方思想影响近现代中国的一般性看法。真正地在具体的历史的研究中把这些看法充分地体现出来,把其中的环节深入地揭示出来,则是需要花大力气的。这既是我自己正在努力进行的工作,也是我对本书作者的希望。

2000年7月8日于上海

Preface

Roger T. Ames (安乐哲 University of Hawai'i)

I take great pleasure in writing a preface for the publication of the new edition of Professor GuHongliang's ground-breaking monograph, *Misreading of Pragmatism*. Professor Gu is a cosmopolitan scholar who now is a philosophy professor at ECNU after spending much research time at some of the most prestigious seats of higher learning in Europe, America, and Asia. I share with him a deep and abiding commitment to a global understanding of the discipline of philosophy. The new edition of this monograph has served the Chinese academy well in breaking from a past, superficial understanding of pragmatism and in offering its readers a new, nuanced and sophisticated interpretation of this stream in the Western philosophical narrative. Indeed, pragmatism in its own time was such a revolutionary break in Western philosophy that it has taken a full century for not only Chinese scholars, but Western scholars as well, to come to appreciate the scale of its challenge to old ways of thinking.

Two important events mark the publication of this new edition.

First, ECNU is holding a conference to celebrate the 100th anniversary of Mr. FengQi's birth. All students of Chinese philosophy, Chinese and Western, are necessarily students of FengQi. His seminal contribution to Chinese philosophy in the 20th Century has been enormous, and like all of us, I am

grateful to him for the sustained quality, and the reach and influence of his scholarship. I am also personally indebted to this wonderful man for taking me into his home, and for the warm encouragement he gave to a young and naive Roger Ames many decades ago.

Second is the occasion that Professor Gu and I had to spend time together at the celebratory conference at Fudan University's Dewey Center in August 2015 when ECNU's Press unveiled the publication of the Chinese translation of the complete works of John Dewey. This historic occasion brought many of the world's leading scholars in pragmatism to the gates of China, and will be remembered as a turning point in the evolution of both pragmatism and Confucian philosophy. Over the past two decades—and the important corrective introduced into the Chinese understanding of pragmatism by Professor Gu's book that was published in 2000 is significant here—Chinese scholars have come to understand the important resonances to be found between the experimentalism of pragmatism and traditional Confucian philosophy.

The strength of Confucian philosophy has always been its porousness—its capacity to absorb the best ideas of traditions that would compete with it, from Buddhism as the first wave of Western learning coming from India in the 2nd Century down to German philosophy and Marxism in the contemporary world. Indeed, if German philosophy was an inspiration and resources for an evolving Confucian tradition in the 20th Century, I predict that it will be the confluence of Confucianism and pragmatism in the 21st Century that will be a new direction for world philosophy in the decades to come.

It is widely recognized that the most important international relationship for securing the 21st century in all of its different dimensions is that between America and China. Within academic circles the many resonances between Confucian and American philosophy have been much noticed, and the process of establishing a dialog between these two traditions is underway. It goes without saying that a relationship of trust and understanding requires a vocabulary that expresses shared values and cultural aspirations, as well as the many differences that make cultural

exchange an opportunity for mutual stimulation and enrichment.

Consistent with the commitment to immediate empiricism of both pragmatism and Confucian philosophy, it is the research of scholars such as Professor Gu that will make a concrete difference in the contemporary world. Such research will hopefully conduce to a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the common values between Chinese culture and its Western counterpart and provide a shared vocabulary for a continuing dialogue. I am particularly concerned about the sometimes troubled relationship between America and China. If we can be successful in promoting a trusting and collabora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se two great nations in our own time, the 21st Century can be secured. And there really is no alternative. It is his substantial contribution to this very pragmatic goal that makes this second edition of the *Misreading of Pragmatism* an important event for our times.

值此顾红亮教授的《实用主义的误读》一书再版之际,为这部佳作作序,我倍感荣幸。顾红亮教授目前任教于华东师范大学,作为一名具有全球视野的哲学学者,他曾在欧洲、美国、亚洲等诸多享有盛誉的高等学府开展哲学研究。在哲学学科的世界性理解上,我与他共享着深刻而持久的认同。该著的再版,为汉语学界理解实用主义提供了较好的途径,打破了过去对实用主义的肤浅阐释;同时,就西方哲学语境中的实用主义诠释而言,该著还向广大读者提供了新的、细致入微的、富有思辨的解读。的确,对西方哲学而言,实用主义在其诞生的时代具有革命性的突破意义,整整一个世纪以来,不仅是中国学者,西方学者同样也渐渐开始重视实用主义对过去的思维方式所产生的巨大挑战。

两个重要的事件标识了此书的再版。

其一,2015年,华东师范大学为纪念冯契先生诞辰100周年举行了一系列的庆祝活动。在中国哲学领域,无论是中国学者或西方学者,可以说,都受教于冯契先生的思想。在20世纪,冯契先生对中国哲学作出了富有原创性的巨大贡献;我们所有人都感谢其为学术思想领域所带来的具有持续生命力的影响和贡献。就我个人而言,我对这位哲学前辈心存敬意,几十年前,正是他将我带到家中,给予那时年轻而又天真的安乐哲温暖的鼓励。

其二,2015年8月,我与顾红亮教授在复旦大学杜威研究中心的庆祝会议上相遇,同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也正式揭开了《杜威全集》中译本出版的面纱。许多世界一流的实用主义研究者来到中国,见证这一历史性的时刻,学术界将铭记这一时刻,它标识着实用主义与儒家哲学发展过程中的一个转折点。在过去的二十年间——顾红亮教授于2000年出版的《实用主义的误读》一书引入了对实用主义的中国解读,这一解读意味深长——中国学者开始逐渐意识到,在实用主义的实验主义和传统的儒家哲学之间,能够找到重要的共鸣。

多孔性(porousness)一直以来都是儒家哲学的力量所在——儒家哲学能够吸收与之竞争的思想传统中最核心理念,从公元2世纪开始,来自印度的佛教作为第一波西方思潮,直至近现代德国哲学和马克思主义的进入,都是如此。如果说,在20世纪,德国哲学的确是演进中的儒家传统的灵感来源,那么,我预测,在21世纪,儒学与实用主义将会汇聚融合,这将成为未来几十年中世界哲学的一个新的发展方向。

21世纪,中美关系将成为国际关系中确保各方利益最为重要的方面,这一共识已经获得广泛认同。在学术界内部,儒家哲学与美国哲学之间的许多共鸣广受瞩目,两者间的对话也正在推进中。一段相互信任和理解的关系,必须首先拥有一套承载共同价值和文化渴求的语汇,此外,它还必须求同存异,从而促进双方的文化交流,相互激励,共同改进。

实用主义和儒家哲学兼具直接经验主义的面向,与此相一致,诸如顾红亮教授的研究将会切实地改变当代世界的研究进程。可以预期,这样的研究将有益于深刻理解中国文化与其对应的西方思想之间所共有的价值,并提供一套可持续对话的共享语汇。我对中美之间时有发生摩擦忧心忡忡。若我们能够在这两个对我们这一时代而言具有重大意义的国家之间成功推进相互信任与协作的关系,那么,21世纪的发展将是一片坦途。而事实上,关于这一点,并无第二条路可走。《实用主义的误读》一书的再版将有助于实现上述“实用主义”的目标,同时,这也使其再版成为了我们这个时代颇具意义的事件。

(吴闻仪 译)